

“开车不玩手机”应成驾驶者底线

■乔杉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的流行,开车低头看手机、打电话、发短信、玩微信甚至拍照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也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员的关注,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中,有与会人员建议将开车玩手机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

现在“低头族”越来越多,也造成了很多悲剧。而“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的也大有人在,甚至一些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也是“低头族”。在过去,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开车打电话的现象,现在开车时刷微博的危险系数更高,在事实上也酿成了不少事故。在这样的情况下,开车玩手机,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事实上,法律对于“开车玩手机”是有规定的。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一经查获将被处200元以下罚款。只不过,立法没有变化快,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加速到来,微博微信的加速发展,速度和影响都大大超乎意料。

对于开车刷微博刷微信等行为,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改变生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针对手机的应用也会更广泛出现,“开车玩手机”将会更频繁发生,带来的安全威胁将会更加突出。这一背景下,把广义的“开车不玩手机”写入刑法,对于规范驾驶行为,减少事故发生,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如果这样的话,对于驾驶人来说,可能刚开始会不习惯,但如同当初通过法律保证并且推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常识形成一样,这对于道路安全是十分有意义的,是必须经历的转变。

当然,把广义的“开车不玩手

机”写入法律,会碰到一系列的难题。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阮齐谈到的取证问题。对于醉驾的认定,可以通过酒精测试方便地得到结论,但“开车玩手机”存在很大的即时性和不确定性。而且现在还存在手机导航,到底是看手机导航还是看微博微信,容易陷入各执一词中。而这一切,都给立法和执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必须看到,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开车玩手机”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法律来约束。

即便当下写入法律还存在难度,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驾驶人都应该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这一意义上,“开车不玩手机”应像“开车不喝酒”一样,成为一个常识,成为一道底线,被每一个人铭刻在心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只能写入法律,通过法律保证“开车不玩手机”成为新底线。

床位空置 提醒转变养老思路

■言者有意

■唐伟

10月31日,北京市政协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本市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调研报告》显示,政府大量资金投入机构养老,但机构养老床位目前约空置2万张,社区养老未得到应有重视,建议政府资金投入向社区和居家养老倾斜。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评估办法年内出台,届时老人入住公办养老院须接受能力评估。

养老床位空置,当然不是源于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恰恰相反的是,入住物美价廉的公办养老院需要排队等候,可以说是一床难求。2013年有媒体报道,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一个单间的入住价格仅2250元,排队平均要等100年。然而这样的质优价廉明星养老院毕竟是少数,也造成了物以稀为贵的格局。跟“招牌”养老院相比,街道办的养老院却是床位少、空间小、位置偏、护理缺。相反,若要享受优质的服务,则需要入住价格高昂的私立养老院,老人们又根本没有能力入住。

民办的是住不起,公办的是不想住,就构成了时下养老院结构失衡下的两难选择。在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养老成为公共服务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公众“老有所养”,应为当前公共政策的优先选择。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养老机构,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投入粗放,没有正视养老需求的差异化,人为造成了结构性失衡和资源的浪费。北京三年投入82亿元用于养老,然而空余的床位却高达2万张,以每张床位55万元的成本计算,意味着有超过100亿元的资源形成了浪费,将集中式养老说成是“形象工程”一点都不为过。

可以说由于政府大办大揽,忽视了需求的多元化和个体性差异,再加上功能级别评估体系的欠缺,导致了服务供给跟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

对此,要实行两条腿走路,一是学习香港等地的经验,尽快制定和实施老人入住养老院的评估办法,按功能级别提供相应服务,满足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利用好现有的公共养老服务,使之发挥基础性保障作用,比如重点接受失能、失智等政府兜底的困难老年群体,实现其功能的转型。二是要调整政府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由大包大揽和自我承建,到制定规则开放门槛,在激发民间资金参与的同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导向作用。

从国际上看,“公办民营”是实现破题的有效出路,一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政府将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由社会力量和民营资金参与经营,从而达到经营的专业化和服务的优质化;另一方面则是采取政策扶持的方式,对民营养老院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或者由公共财政购买相应的服务。再辅以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实现了市场对接和公益兜底的养老事业,才会避免养老床位空置的体制性尴尬。

总之,解决养老院“住不起和等不起”的结构失衡,真正实现市场与公益的统一,是对公共服务的责任与智慧的双重考验。

“吃货”悲喜剧

■文/言者 图/春鸣

24岁的小吴常在网上搜集美食信息。他发现一家高档自助餐厅搞活动,原价198元,现半价即可。小吴便邀同事结伴前往,为“吃回本”,他一连吃了20盘海鲜和肉食,又干掉3个冰淇淋才罢休。同事们封他为最强“吃货”。当晚,他便因暴食而导致急性胰腺炎送医抢救,住院两周,花去两万多元医药费。

物质社会,贪占小便宜似是普通人的本能,但凡商家有“打折”等促销活动,总能招来如潮的人流。而面对半价的自助餐,“吃货”们也不愿放过饕餮的机会。倘若这些对荷包不带来过重负担,肠胃也可承



受,亦可谓一举两得,互利双赢。糟糕的是,小利面前,有的人便贪欲不止,最终却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正如这位吃货,想吃回几十元的“本”,最终却要花2万多元的代

价。
人们常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对于小利也需适可而止,今日之如虎大贪,又何尝不是从小贪起步的呢?

支持极地科考、关注环境保护

“雪龙号”再赴南极 “安利优生活环保屋”将落户中山站

2014年10月30日上午,中国第31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乘“雪龙”号船出发,执行南极考察任务。第31次南极考察是“十二五”期间一次重要的考察活动,也是中国自1984年以来30年的科研、后勤保障等方面发展情况的一次集中展示。考察队由281名队员组成,“雪龙”号船执行一船三站的南极考察工作。本次考察“雪龙”号船计划从上海出发,完成预定任务后,经由澳大利亚回国,总航程约3万海里,历时163天。

本次启程之前,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与安利公司再次签署支持极地科考的战略合作协议,这也是自2002年起安利连续第五次为中国极地科考提供环保清洁用品等有力支持。根据协议,安利旗下19款产品,包括14款安利优生活产品和5款个人护理产品被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授予“中国南(北)极考察队专用产品”,并随船前往极地使用。同时,南极中山考察站将建立“安利

优生活环保屋”,为考察队员提供高品质的环保生活用品和舒适的洗涤空间。未来,双方将启动新一轮环保巡讲活动,将极地精神和环保理念送进社区。

根据《南极环保议定书》,南极考察的生活用水需经生化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到海洋中,因此南极对清洁用品的要求更为严苛,不能含有磷和其他有害环境的成分,还要可快速生物降解。此外,由于南极科考的物资补给仅靠“雪龙号”每年运送一次,仓储极其有限,所以不仅要求清洁用品具有浓缩性,还需要包装设计合理,以节约储藏和运输空间。从2002年起,在严格考察后,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在南极长城考察站、中山考察站和“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上全面启用安利的环保产品。由于科考队员长期远离大陆,无法食用新鲜的蔬果,营养素摄取不足。自2003年起,中国极地科考队开始使用纽崔莱营养食品,以保障考察队员的身体健康。从2008年开始,安利公司还在

“雪龙”船上设立了“环保清洁屋”。2002年起,安利开启了“极地科考,安利相随”全国巡讲的序幕。12年来,安利公司邀请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的领军者、极地科学家、极地记者等重量级人物,足迹遍及44个城市,举办了78场“极地科考与环保”的主题演讲,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和支持中国极地科考,提升环保意识。安利公司自创立伊始,就把环保视为天职,1959年,安利研发生产的第一款名为LOC的多功能清洁剂,就开始使用可生物降解的清洁成分,避免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一举措在当时美国也是相当领先的,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安利更是在环保理念的指导下不断研发和推出环保清洁用品。安利(中国)总裁黄德荫表示,安利公司将继续研发具有环保特性的产品,坚持在生产过程中贯彻环保理念,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并积极推动公众环保教育,为保护地球,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尽一份企业公民的责任。



关注公检法司
维护公平正义
服务百姓生活
推进法治进程

邮箱:zkwbzfb@126.com zkrbghc@126.com

监督热线:15936909988 13838686789